

值原则，欧洲国家应该无保留地开放边境接纳难民，但难民潮带来的国内治理压力又让欧洲国家不得不限制难民入境。

自由秩序的悖论

世界秩序的大变局事实上提出了一个“自由世界秩序”悖论：“自由世界秩序”因包容了非自由政体而强大，也因强化了自由而危机重重。在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内部，“自由世界秩序”因包容了诸多“非民主政体”才使得“自由世界秩序”拥有了打败敌对秩序的能力。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似乎应该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去强化世界秩序，然而冷战后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至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政策，结果又必然破坏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

“自由世界秩序”悖论其实也验证了一个常识，没有哪个国家能靠空洞的价值吃饭和打天下，“历史终结论”同样不能治国治世。大国得不到有效治理，结果危及的就是世界秩序。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既有世界秩序的性质到底是

什么？世界秩序有价值上的自由、政治等级性、经济极度不平等性和世界政治上的事实性霸权。正如作为自由主义一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国内加剧了不平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策同样会加剧世界秩序中的不平等以及其他乱象。这就意味着，虽然冠以“自由”，但世界秩序的根本属性却还是不平等和霸权欺凌所导致的不自由。因此，世界秩序需要变革，在大变革中寻找新共识，让新世界秩序少一些不平等，少一些霸权。这就需要新的国家提供新的治理能力。

新秩序未来可期

中国人常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只有强大起来的中国才有可能提出关于新世界秩序的“中国方案”。基于中华文明基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无疑包含着基于和而不同的多种文明并存的思想。这种文明图式与一元论的“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完全不同。文明图式或者文明愿景都是一种“软实力”，其未来命运如何，

最终取决于各主要国家的财富权力。因为中国道路的有效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学习中国经验，虽然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2月世界政党大会上提出我们既不输入别人的模式，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一些非洲国家就是在按照中国经验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

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如何在未来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新世界秩序”自然是可以期盼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里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种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只不过，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都是西方文明强势影响乃至改造其他文明，而多种文明共存的世界应该是不同文明相互包容，而非彼此竞争压制。^[7]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经济大势

文 / 沈铭辉

百年大变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批新兴国家的实力大幅上升。2010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趋势性变化愈发明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纷纷发布对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预测，预测的时间节点通常选择在2030与2050年。两个时间节点的选取，主要是出于全球经济排名发生根本性

变化的考虑。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2030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印度则将在2050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印两国的快速发展赋予了世界经

济中长期预测的指标性意义，同时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也将具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潜力。

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

2030年，世界经济版图很可能因为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的“交接”而发生改变。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和中国共拥有世界23.1%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全球40.2%，世行预测中美两国将为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增长贡献52.7%的力量。世行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力量的天平已经“缓缓地朝着正强势崛起的中国经济倾斜”。其实，多个国际组织已经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虽然购买力平价指数的经济学意义仍存在争议，但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近20年来快速增长积累的“量变”动能，迟早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产生“质变”效果。按照这一趋势，到2030年，以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印度则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将依次为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德国，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排名也将有所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由2015年的46%上升到2030年的66%，从而彻底扭转“欧美+日本”这一传统发达经济体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

2020年1月21日至24日，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开幕，嘉宾们讨论了如何应对贫富差距和政治极化造成的社会分裂等问题。

供图/CNSphoro



到2050年，虽然部分国家面临内外部因素制约，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趋势是，世界经济力量将会持续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从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将会持续增加。普华永道根据其在2006年开发的长期全球经济增长模型，预测到2050年中国、美国与印度会牢牢占据全球经济三强的位置，并与其他国家拉开明显差距。同时，印度尼西亚将会超越日本、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届时，全球最大11个经济体中有六个是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俄罗斯）。该预测虽然在具体排名上与其他预测有所不同，但2050年中美印成为全球经济三强的结论却是共识。

除了这三国以外，欧盟地区

被认为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经济板块。21世纪初，欧盟一度被广泛认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本”，也是最具潜力的共同市场组织，其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市场规模均居全球首位。但自2008年以来包括国际金融危机、“难民潮”、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事件沉重打击了欧盟一体化进程，也削弱了外界对欧盟的信心。如果欧盟能顺利化解这一系列危机并重新走上正轨，那么以当前趋势看，2050年其经济总量将与美国等量齐观，居全球第三或者第四，形成中、印、欧、美或者中、印、美、欧四大经济板块。

不确定性因素与优势并存

未来三十年，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一是国内改革存

在不确定性。根据2018年数据，越南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国内改革遭遇“瓶颈”，依靠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受到质疑。巴西经济自2014年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以来持续疲软，国内政局动荡，经济上出现“逆工业化”趋势，若要跻身205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行列，就需要在近年克服这些困难。2003年至2017年，土耳其经济表现亮眼，经济总量增长231%至7695亿美元，人均GDP增长176%至9647美元，许多研究机构把土耳其看作新兴经济体的表率。然而，2018年以来土耳其经济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陡然升高，债务水平高企，汇率波动加大，国家发展出现较大不确定性。

另一个是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走完存在不确定性。实现工业化是一国真正变强的标志，也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的基础。

自互联网技术面世以来，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生物制药、人工智能、新材料、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新科技革命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并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给传统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运用新技术、适应新模式的难度。以智能化、个性化、分散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以劳动密集、资本集约、生产标准化为特征的“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当前全球化所依赖的国际分工模式受到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面临在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时即遭遇新技术挑战的局面，这既是机遇，更蕴含危险。

此外，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也各有优势。其中发达经济体在资金、技术、制度上占有优势，而

发展中国家则有人口、市场与发展潜力优势。虽然新兴经济体就个体看来面临一些挑战与不确定性，但作为一个整体仍具有趋势性的发展前景。普华永道报告预测，到2042年全球经济总量将会比2016年翻一番，在此期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5%，其中发达经济体为1.6%，而发展中经济体为3.3%，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七国能达到3.5%。到2050年，这七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近一半，而传统七国集团（G7）的占比将缩减至20%。

经济大变局中，既有乱局之忧也有破局之机。只有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变化趋势，才能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窥见百年未有之大机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是国际体系变动中的最显著变量

文/倪峰

大约是在100年前，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以此为起点，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20世纪甚至被称为是“美国世纪”，其间美国赢得了一战、二战、冷战，逐步建立起由其主导的世界体系，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独步天下，踌躇满志。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在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人类历史上霸权盛

极而衰的一幕似乎又在重演。

新世纪面临的撕裂

一段时间来，美国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不断发酵：一方面，美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大体量、最高水平的经济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世界的财富中心和创新中心；另一方面，美国又是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最为严重的西方国家，标榜自由、民主、

人权，崇尚所谓道义。同时，它还是西方社会最为赤裸裸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信奉资本为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嬗变，这些内在矛盾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张力，撕裂着美国，同时加剧着它与外部世界的矛盾。面对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数波巨型冲击，美国实力损伤严重，谋霸雄心与护霸能力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汹涌而起，尤其在蓝领白人中产群体